

# 盛唐诗歌的传播路径与接受谱系探析

李佳凝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 摘要

盛唐诗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 其生命力不仅源于卓越的艺术造诣, 更在于其复杂而有效的传播机制与历久弥新的接受历程。本文旨在跳出单一的文本内部研究, 从传播学与接受美学的外部视角切入, 系统梳理盛唐诗歌在当世及后世的流布网络, 分析其从“声诗合流”的即时传播, 到历代“选本批评”的经典化过程。通过考察不同历史语境下读者群体的阐释差异, 本文试图揭示盛唐诗歌如何从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 演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并探讨其在跨时空接受中所彰显的文化认同价值。

## 关键词

盛唐诗歌, 传播机制, 接受谱系, 经典化, 文化认同

#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Pathways and Reception Lineage of Poetry from the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Jianing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5, 2026; accepted: July 21,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 Abstract

As the pinnacl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vitality of Tang poetry comes not only from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 but also from its complex and effectiv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enduring acceptance process. This article aims to break out of a single textual internal study, approaching from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reception aesthetics,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circulation networks of flourishing Tang poetry in both contemporary and later times, analyzing its process from the immediate dissemination of “merging sound and poetry” to the canonization of “anthology criticism” throughout the ages. By examining the interpretive differences among readers in various historical contex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how the poetry of the High Tang Dynasty evolved from the literary trend of an era into a shared cultural ge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xplor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value it manifests in cross-temporal reception.

## Keywords

High Tang Poet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Reception Lineage, Classicization, Cultural Ident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盛唐气象”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自宋代严羽提出以来，一直是唐诗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它不仅指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貌，更承载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理想。盛唐诗歌以其宏大的气象、深邃的意蕴与精湛的技艺，构筑了中国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诗人个体研究、艺术风格辨析或断代文学史梳理，而对诗歌文本如何进入社会流通、如何被不同时代读者解读的“动态过程”关注相对不足。事实上，任何文学作品的价值实现，皆依赖于传播与接受的双向互动。盛唐诗歌之所以能突破时空局限，从唐代的长安、洛阳走向后世的庙堂与江湖，实乃一套精密的传播系统与多元的接受史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尝试勾勒盛唐诗歌传播与接受的宏观图景，并结合既有研究成果，对“盛唐气象”的内涵、艺术特征、成因及代表性诗人进行系统梳理。

## 2. “盛唐气象”的内涵、成因与代表性诗人

在讨论传播与接受之前，有必要对“盛唐气象”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成因及代表性诗人进行系统梳理，这是理解其传播动力与接受机制的基础。

### (一) 内涵界定

关于“盛唐气象”的内涵，学界存在一定的共识与分歧。赵蕊指出[1]，“盛唐气象”不仅指盛唐诗歌表现出的蓬勃、昂扬向上的艺术特点，也代表盛唐特有的时代风貌。她引用林庚的观点，认为这蓬勃不只源于盛唐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姜丽芹则强调，盛唐气象是盛唐诗歌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的整体风貌，即使是恬静的山水田园诗，也尽显生机盎然。刁秀琦从美学范畴“气”的角度切入，指出盛唐诗歌中的“气”表现为审美主体之气、审美对象之气与艺术作品之气的统一，具体体现为淡泊清远、慷慨悲壮、豪放洒脱、沉郁内敛等多种形态。这一观点丰富了对“盛唐气象”审美维度的理解[2]。

### (二) 形成原因

多位学者一致认为，盛唐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开放是“盛唐气象”形成的根本原因。赵蕊指出[1]，唐代科举制度、疆域辽阔、中外交流频繁，使士人胸怀开阔、情绪积极。奥日莎也强调[3]，盛唐诗人主动选择高尚的社会角色，走向江山塞漠，极大地拓展了诗歌题材与思想深度。

前代文学的铺垫同样不可或缺。陈子昂的复古主张、建安风骨的继承、六朝声律的扬弃，都是盛唐

诗歌得以成熟的重要条件。黄琪指出[4], 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的兴起, 正是对汉魏诗歌传统的恢复, 尤其是阮籍《咏怀》、陶渊明《饮酒》等作品的影响深远。她还指出[5], 盛唐诗人广泛化用魏晋诗句, 如李白、杜甫、王维等人对阮籍、陶渊明、陆机、郭璞等诗人的语汇与句式进行吸收与改造, 形成了一种以故实入兴象的创作范式。

都城文化的催生同样不可忽视。朱轩从都城诗的角度分析[6], 认为盛唐都城长安与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孕育了大量宫廷诗、市井诗、园林诗及文人交游诗。这些诗歌或昂扬壮丽, 或悲壮沉郁, 共同构成了盛唐气象的多元表达。他还指出, 都城诗中对“长安道”“都城少年”“千秋节”“华清宫”等意象的书写, 极大地丰富了盛唐诗歌的意象系统。

### (三) 代表性诗人

李白被公认为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诗人。赵蕊指出[1], 李白的诗歌以“气”为主, 以自然为宗, 展现出浪漫、慷慨、昂扬的生命力。姜丽芹从诗酒、山水、明月三个意象切入, 分析了李白诗歌中的盛唐精神。廖滢杰(《从盛唐诗歌中看盛唐气象》)认为[7], 李白以宏观视角、夸张想象和强烈主观色彩, 营造出吞吐万物的气魄, 是浪漫主义的巅峰。

赵蕊将陈子昂视为盛唐诗歌的开端, 认为其《登幽州台歌》初步显示出宏大的气魄与沉郁的风格。奥日莎则指出, 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 虽风格清幽, 却同样充满生机与自信, 是盛唐气象中“淡泊清远”一极的代表。黄琪进一步指出[4], 张九龄、储光羲、常建、贺兰进明等人的五言“古风”创作, 形成了开、天诗坛复古风气的重要一环。

## 3. 多维立体的传播机制：盛唐诗歌的社会化流通

盛唐诗歌之所以广泛流布, 与当时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和后世主要依靠印刷品进行单向传播不同, 这一时期的诗歌流传往往交织着人际互动、口头传唱与书面记录, 形成一种立体化的流通格局。

### (一) 诗人交往与在场的即时传播

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年代, 诗人之间的交往是诗歌传播最直接、也最鲜活的渠道。盛唐文人普遍有漫游、交游的习惯, 诗歌常常成为他们沟通情感、展示才华的媒介。李白《金陵酒肆留别》中“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 正是他在金陵送别友人时的即兴之作, 借由赠答的形式在文人圈内迅速流传。

人际传播的方式远不止私人赠答和文人雅集。唐代盛行的“行卷”制度, 便构成了一种制度化而带有功利目的的人际传播网络。士子在科举之前把自己的诗文编录成卷, 投献给公卿贤达以邀延誉, 直接推动了诗歌文本在权贵和精英阶层中有针对性地流传与品评。能否得到韩愈、贺知章这类文坛盟主的一句褒扬, 往往决定了一位诗人能否声名鹊起。这一机制将诗歌传播与科举晋升紧紧捆绑在一起, 使诗歌不仅是抒情的艺术, 更成为关乎现实前途的一种“文化资本”。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的轶事, 虽然出自笔记小说, 却折射出当时诗歌传播的公共性。当名公巨卿揄扬某位诗人时, 个人的声望便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 借由士人群体的社交网络迅速扩散, 短时间内就能为其奠定诗坛地位。

### (二) 声律媒介的转化：从案头文本到听觉艺术

盛唐也是“声诗”空前繁荣的时期。诗歌一旦与音乐结合, 传播的边界便豁然开朗。大量五言、七言绝句和律诗被教坊乐工拿去谱曲, 成为燕乐、大曲中的歌辞。王维那首《送元二使安西》, 经谱曲后成了《渭城曲》, 乐工反复演练, 渐渐变为饯行仪式上不可或缺的压轴曲目。视觉上的文字, 就这样化作通俗的旋律, 入了耳。在市井的勾栏瓦舍、乃至边塞军营之中, 士兵和百姓即便不识字, 仅凭听觉也能领略诗中的离情别意。音乐的感染力打破了阶层之间的隔阂, 文人苦心锤炼的词句, 因此得以在最大范围

内被感知。可以说，乐工与歌伎正是盛唐诗歌的“扩音器”，是将精英文化输往大众的最重要桥梁。

从诗歌艺术特征来看，盛唐诗歌在语言上追求“词约旨达”，即用简约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意蕴，追求“韵外之致”[3]。绝句的繁荣、兴象的营造、言外之意的追求，都与“声诗合流”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句式整齐、韵脚响亮的诗歌更容易入乐传唱，这反过来也塑造了盛唐诗歌的语言样貌。黄琪也指出[4]，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在语言上力求避免律句，追求古体诗的音响效果，体现出对汉魏诗歌传统的自觉回归，这同样是对听觉传播需求的回应。

### (三) 文本固化与商业潜流：从手抄到版刻的过渡

城市商业日渐繁荣，人们对文化商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盛唐时期，雕版印刷虽还主要用于佛经、历书一类，手抄本的流通却已颇具规模。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记白居易诗“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说的虽是中唐情景，但回过头看，盛唐后期这类买卖已非罕见。秘书省、弘文馆置有专职的“楷书手”，民间也活跃着大批以抄写谋生的“经生”。诗歌一旦有了市场需求，便迅速被这些职业抄手抄录复制，变成可以计价买卖的商品。这一变化甚至催生了早期以诗文获酬的“润笔”之风，也让作者隐隐有了“我诗即我物”的意识。

书商和职业抄书人对行情嗅觉敏锐，他们拣选名家名篇，集中抄录出售，这不仅加快了文本面貌的统一，也让诗歌得以从创作现场脱身，成为可供收藏、转手的独立之物。敦煌遗书中保留的那些通俗诗卷，便说明了即便远在边地的僧侣和普通百姓，也能接触到长安城里流行的篇什。

## 4. 历时性的接受谱系：阐释重心的嬗变与经典化

传播解决的是诗歌如何“走出去”，接受则关乎诗歌能否“留下来”。盛唐诗歌在后来并非被一成不变地供奉，而是在不同时代的阅读眼光中，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

### (一) 当世接受：即时共鸣与风尚塑造

在盛唐当时，诗歌的接受首先发生在“现场”。对那些锐意进取的士人而言，边塞诗中的昂扬意气与山水诗中的玄远之趣，恰好呼应了他们建功立业和精神逍遥的两重向往。读者与诗人身处同一股时代风潮之中，一首诗被读到，往往便是一次即时的情感共振和价值认同。

从艺术特征来看，盛唐诗歌在情感表达上具有“至真至情”的特点，诗人以诗缘情，敢于抒发对天地万物的热爱与关怀，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人无不以情驭诗，情感大开大合，极具感染力。这种强烈的情感表达，正是其能够在当世引发即时共鸣的内在原因。刁秀琦也指出[2]，盛唐诗歌中的“情”不仅是个人情感，更是家国情怀与宇宙意识的体现，这使得诗歌的接受超越了个人层面，上升到时代精神的共振。

### (二) 中晚唐至宋：反思、追慕与批评标准的确立

安史之乱后，社会心理发生剧变，对中晚唐诗人的接受带有浓厚的“反思”色彩。杜甫因其诗歌对战乱苦难的真实记录，被元稹、韩愈等人拔高为“诗史”，其沉郁顿挫的风格成为矫正浮艳诗风的良药。赵蕊指出[1]，杜甫虽然在安史之乱后创作了大量沉郁顿挫的诗篇，但其早期作品同样充满盛唐气象。姜丽芹将杜甫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指出其青年时期的豪迈、中年时期的忧患、晚年时期的悲壮，都是盛唐气象的不同侧面[8]。

与此同时，宋代文人出于对“盛世元音”的向往，极力推崇盛唐气象。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盛唐诸人唯在兴趣”，以此贬斥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这一时期，诗歌批评与选本编纂相结合，通过对盛唐诗歌的筛选与品评，初步确立了其“不可企及”的经典地位。黄琪指出[4]，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的创作，是对南朝以来隶事炫富、声律浮靡风气的有力纠正，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等人的“古风”组诗，恢复了汉魏诗歌的兴寄与风骨传统，正是这种复古精神使其在宋代获得了高度推崇。



### (三) 明清以降：教化功能的强化与世俗化渗透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僵化与理学思想的笼罩，使得盛唐诗歌的接受趋向于道德化与格调化。沈德潜等选家强调诗歌的“温柔敦厚”之教，将王维、杜甫等人的作品纳入正统意识形态的宣教体系。与此同时，随着戏曲、小说的兴起，盛唐诗歌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符号，频繁被植入通俗文学之中。这种“雅俗互渗”的现象，一方面巩固了诗歌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其意义趋于泛化与固定化，成为衡量文人修养的标尺。

在审美维度上，盛唐诗歌的“清真自然”与“风骨之力”两大特征在此时期被进一步提炼和定型。奥日莎指出[3]，“清真自然”表现为冲淡平和的语言、语淡味浓的叙述、素淡空灵的颜色渲染以及尚清的审美趣味；“风骨之力”则体现为气势纵逸、刚健慷慨的诗风，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以“风骨”评价王昌龄、高适、崔颢等人，表明风骨已成为盛唐诗歌的普遍追求。明清选家在编纂唐诗选本时，正是基于这两大审美维度进行了经典化的筛选。

在庙堂，盛唐诗歌通过《唐诗品汇》等官修选本，被纳入“温柔敦厚”的诗教体系，成为塑造士大夫人格与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民间，其影响则更为绵密地渗入日常生活：《唐诗三百首》成为童蒙教育的核心读本，王维、李白的诗句在孩童的琅琅书声中完成最基础的经典化植入；同时，诗歌意境被转化为园林造景、书画题材与文人清玩的审美标准，实现了从文本到生活美学的全方位覆盖。

## 5. 传播与接受背后的文化意涵：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 (一) 传播网络与社会结构的映射

盛唐诗歌的多渠道传播，实际上是唐代开放、包容社会结构的缩影。人际传播的活跃，反映了士族门阀制度瓦解后社会流动的加速；声诗合流的盛行，印证了胡乐入华带来的文化融合；商业出版的萌芽，则预示着市民阶层的崛起。诗歌的流通过程，实质上勾勒出了唐代社会的权力图谱与文化版图。

从美学角度看，盛唐诗歌中的“气”与这种开放社会结构形成了内在呼应。刁秀琦指出[2]，盛唐诗歌中的“神来”“气来”“情来”三者统一，构成了中国美学中“气韵生动”的典范。这种自由奔放、充满自信的精神气质，正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反过来通过传播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

### (二) 接受嬗变中的民族精神积淀

不同时代对同一首诗的不同解读，折射出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层结构。无论是战乱年代的“诗史”寄托，还是太平岁月的“格调”讲求，亦或是现代的“审美”回归，盛唐诗歌始终扮演着民族精神“容器”的角色。那些反复被提及的名句已然超越了字面意义，凝结为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励志原型与价值判断。接受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精神内核不断被唤醒、确认与强化的过程。

盛唐诗歌的艺术特征体现了盛唐人的“诗性思维”，即与天地同感、直觉感性、自由奔放的思维方式。这种诗性思维不仅是盛唐诗歌的审美基础，也在历代接受中被反复激活，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 经典的永恒性与开放性悖论

盛唐诗歌的经典化，证明了伟大的文学具有抵御时间侵蚀的力量。然而，这种经典地位的确立，并非源于一成不变的固化解读，恰恰相反，正因为它能被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地“误读”与“挪用”，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它才能永葆生机。传播保证了文本的广度，接受赋予了文本的深度。盛唐诗歌正是在这种广度与深度的张力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

### (四) 当代语境下的变化与挑战

历史的考察最终需观照当下。在数字时代，盛唐诗歌的传播与接受正经历千年未有的新变。传播路径上，突破了物质载体与人际网络的物理限制，通过影视配乐、诗词吟唱综艺(如《经典咏流传》)、社交

媒体分享、短视频解读甚至人工智能创作互动。然而,这种新媒介环境也带来了接受层面的深刻挑战。一方面,“快消式”的视听转化与碎片化传播,可能导致对诗歌深层次意蕴与历史语境的疏离,接受趋于浅表化与娱乐化。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塑造的“信息茧房”,可能使大众的接受视野局限于最流行、最易共鸣的少数名篇,而忽略了盛唐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与整体的丰富性。这提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传播红利时,如何引导公众进行“深度接受”,如何利用新媒介本身来阐释复杂性,而不仅仅是消费知名度?这要求当代的传播者与教育者,不仅要充当传统的“搬运工”,更要成为精心的“引路人”,在激活诗歌当代活力的同时,守护其历史的深度与精神的厚度。

## 6. 结语

综上所述,对盛唐诗歌传播与接受的追溯,犹如勘察一条文明长河的奔流轨迹。它发源于诗人灵感的泉眼,经由人际网络、音乐旋律与文本商品的多重河道奔腾扩散,其流域之广,映射出唐代社会的开放图景。从唐人的即时共鸣,到宋人的法则提炼,再到明清的教化渗透,直至当代的媒介重构,每一次重要的接受转折,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这座文化富矿的再度开采与冶炼。其永恒魅力,正源于这种在持续传播中保持开放性的特质。“盛唐气象”作为一个多维度的诗学范畴,既包含雄浑、刚健、豪放、清远等多种艺术风格,也承载着盛唐士人的家国情怀、人生理想与文化自信。它在传播中生成,在接受中延续,在阐释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这不仅是唐诗的胜利,更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力见证。

## 参考文献

- [1] 赵蕊. 盛唐诗歌中的“盛唐气象”探究[J]. 牡丹, 2021(14): 56-58.
- [2] 刁秀琦. 中国美学范畴“气”的审美解析——以盛唐诗歌为例[J]. 今古文创, 2022(37): 32-35.
- [3] 奥日莎. 盛唐诗歌艺术特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20.
- [4] 黄琪. 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的诗史意义[J]. 文学评论, 2020(5): 91-99.
- [5] 黄琪. 盛唐诗用事的比兴精神、创作范式及诗史意义[J]. 文学评论, 2023(3): 207-214.
- [6] 朱轩. 盛唐都城诗与盛唐气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大学, 2022.
- [7] 廖滢杰. 从盛唐诗歌中看盛唐气象[J]. 青年文学家, 2023(11): 87-89.
- [8] 姜丽芹. 我看盛唐诗歌中的“盛唐气象”[J]. 思维与智慧, 2022(8): 51-52.